

中国新文学研究史

刘卫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中国新文学研究史

刘卫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出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文学研究史/刘卫国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097-7121-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研究—文学思想史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470 号

中国新文学研究史

著 者 / 刘卫国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624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121-1

定 价 / 1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001
-----------	-----

上卷 喧闹中的开辟 (1917 ~ 1927)

第一章 新文学研究的开辟	005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发生和批评群体的涌现	005
第二节 理论的译介与批评标准的确立	015
第三节 新文学批评的喧闹局面	025
第二章 作家研究的起步	031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展开	031
第二节 郭沫若和郁达夫研究的起步	051
第三节 对其他作家的评论	070
第三章 文体批评的展开	083
第一节 众声喧哗的新诗批评	083
第二节 初现繁荣的小说批评	098
第三节 略显空泛的戏剧批评	104
第四节 稍嫌薄弱的散文批评	112
第四章 文学史编纂的准备	118
第一节 罗家伦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	118
第二节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20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对新文学的记载	124

中卷 裂变中的发展（1928 ~ 1937）

第一章 文学批评的多元分化	131
第一节 政治裂变中的文学论争	13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兴”	139
第三节 自由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	147
第四节 其他倾向文学批评的进展	156
第二章 作家研究的进展	164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热潮	164
第二节 “五四”作家群研究的进展	183
第三节 评论“文坛上的新人”	204
第四节 作家传记写作的热潮	240
第三章 文体批评的发展	256
第一节 小说批评的大发展	256
第二节 散文批评的大繁荣	274
第三节 新诗批评的新收获	285
第四节 戏剧批评的新进展	300
第四章 文学史编纂的起步	313
第一节 新文学进入文学史	313
第二节 专题研究的展开	330
第三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撰史贡献	346

下卷 战火中的抉择（1937 ~ 1949）

第一章 文学批评的政治化抉择	361
第一节 战争年代的文学批评	361
第二节 解放区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尺度	370

第三节	国统区文学批评话语的竞争	379
第四节	思想统一序幕的拉开	387
第二章	作家研究的新动向	397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新成果	397
第二节	对国统区作家的新评价	418
第三节	对解放区作家的关注	446
第四节	对其他地区作家的批评	462
第三章	文体批评的新变化	478
第一节	戏剧批评的重大进展	478
第二节	新诗批评的再度勃发	493
第三节	散文批评的新焦点	508
第四章	文学史编纂的进展	521
第一节	思潮史与运动史编纂的成果	521
第二节	具有史著雏形的“准文学史”	531
第三节	艰难环境中的文学史著述	541
结 语		548
附录	新文学研究者简介	554
后 记		584

导 言

本书记述 1917 ~ 1949 年间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历史。在中国，“新文学研究”和“新文学创作”有着几乎同步的历史，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遗产。

然而多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重心一直在“新文学创作”，而相对忽视“新文学研究”。特别是对 1949 年之前的“新文学研究”成果，学界关注不多，重视不够。学术研究往往是先因后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为了开拓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新局面，我们应该摸清“新文学研究”的家底，科学地继承和总结“新文学研究”的成果，作为继续前行的基础。本书就是对“新文学研究”的一次摸底，试图描绘出 1917 ~ 1949 年间“新文学研究”的历史面貌。

为了让历史的面貌更为清晰，本书将这段历史再细分为三个时期。

1917 年初到 1927 年底，是新文学研究的“开辟”时期。“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新文学”，同时也催生了对“新文学”的批评。这些文学批评是对新文学的最早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研究成果还是初步的，有的还不免带有幼稚性，但它所保存的当时学界对新文学的反应，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后世所无法复制的。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开始涌现和形成，呈现出开辟时期特有的“众声喧哗”之气象。

1928 年初至 1937 年 6 月，是新文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新文学研究阵营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裂变，但在裂变中，新文学研究依然得到了重要的发展。一方面，各种批评理念开始成熟，批评家标举各自的理论旗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民主主义等各种流派，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文学研究的形式逐渐完备，像作家论、作品论、作家自传、作家评传、作品选编等已被广泛运用，还开始了大规模的为新文学造“史”的活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研究，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越了上一时期。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到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是新文学研究的“抉择”时期。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在国家命运的决定性时刻，新文学批评和研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政治大局。文学批评必须在敌/我、国/共两军对垒中选边站，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政治化渐成唯一选项。虽然也有人不满、抗拒，但却难以扭转这一局面。在这一阶段的末尾，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新文学研究加速走向政治一元化的轨道。

根据上述对新文学研究历程的认识，本书将这三个时期，分为三编《喧闹中的开辟》《裂变中的发展》和《战火中的抉择》分别记载和评述。

本书的首要目标在于建史。为此，本书坚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一一检读、摘取、编构，力求尽量完备地描绘出历史的原貌。不过，三十多年留下的全部史料不可能都写进历史。本书在建史之时，试图抓住每一时期新文学研究中相对集中的一些现象，作专题性的描述和评价，这样有利于展现各个时期新文学研究的概况和特征，也有利于勾勒出新文学研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线索。当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本书的尝试难免会有许多幼稚和舛误之处，恳切地希望听到方家的批评或建议，以便今后做出调整和改进。

上 卷

喧闹中的开辟

(1917 ~ 1927)

本卷记述 1917 ~ 1927 年间新文学研究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新文学研究，以文学批评为主要形式。通常而言，文学批评是对文学创作的评论，先有创作，后有批评。但在新文学发生过程中，文学批评却走到了文学创作的前面。文学批评通过呼唤“文学革命”，催生了新文学。新文学诞生之后，文学批评又为新文学的成长鸣锣开道、保驾护航，帮助“开辟”新文学前行的道路。

在这个开辟过程中，首先分化出文化保守阵营和新文学阵营，文化保守阵营质疑新文学的合法性，试图将新文学扼杀在摇篮之中，新文学阵营则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为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新文学成长起来以后，新文学阵营内部又因为理论资源的不同，进一步分化成多个批评群体。这些批评群体对新文学有着不同的设计与想象，有着不同的评论角度和看法，因此，各个批评群体之间，又发生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论争。可以说，这是一个“喧闹”的时期。

在喧闹的论争中，论争双方的敌我意识开始形成，经常把不同观点的表述看作你死我活的战斗，这就形成了激进的批评风气，出现“话语暴力”现象。

但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哪个作家有确定的历史定位，无分高低；对各种新文体的发展也有各式各样的设计与想象，难分轩轻。甚至对新文学的合法性，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文学批评虽然有激烈的论争，但还很少受到来自政治的干预。各种各样的评论都可以自由发表，没有禁忌。自由的评论，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新文学批评成果，也为后来的新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多向发展的空间。

1917~1927年，新文学创作才走过十年的路程，历史很短，但是新文学阵营出于建史的自觉，已开始了编纂新文学史的尝试。研究者或者梳理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记述其社会历史背景；或者论证新文学的历史合理性，并对新文学的发展作初步评述。这些尝试，虽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但对后来新文学史的编纂有开创之功，值得铭记。

总的来说，尽管这一时期的新文学研究还是初步的和粗糙的，但自有开辟时期的蓬勃气象。

第一章 新文学研究的开辟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发生和批评群体的涌现

新文学批评的发生与特征——新文学反对派的批评——《新青年》批评群体的贡献——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批评——语丝社和新月社的批评——革命文学派的批评

文学研究包括三大门类，分别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雷内·韦勒克曾这样界定这三大门类的分工：“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原理、范畴、标准等方面，而关于具体文艺作品的研究不是文学批评就是文学史。”^①在这三大门类中，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主帅，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都要以文学理论为指导，而文学批评则为文学研究的先锋，文学史为文学研究的后续部队。文学研究的通常程序是，在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文学批评先行开路，创造出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各种文体研究的成果，之后，由文学史予以整理记载。

在新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很好地扮演了先锋的作用。一方面，设计和发动了“文学革命”，为新文学的诞生鸣锣开道；另一方面，又对新出现的文学创作成果和文学现象进行了跟踪批评和及时总结，创造出了众多成果，为后来的文学史编纂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在古代中国，批评家的数量一般来说少于作家数量，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比，相对沉寂。但在现代中国，几乎每个作家都写过文学批评文章，还出现了一些职业的批评家，不少读者也纷纷投文报刊，发表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看法。这样算来，批评家数量超过了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文

^① 雷内·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收入其著作《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第1页。

学史上还是头一遭。

在古代中国，文学批评往往是个人即兴的事情，而在现代中国，批评家往往参与某一文学团体，文学批评成为一件有组织的事情。郭沫若曾说：“我们是最厌恶团体之组织的，因为一个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①可事实上，郭沫若并不厌恶“团体之组织”，因为他也创建了创造社这一团体。郭沫若的这段话从另一面揭示了自己组织团体的隐秘动机，即组织团体就可以“依恃人多势众无怪不作”。这种组织起来、集团作战的思路，对于文学运动的推行是十分有效的。关于这一点，新文学的反对派学衡派看得很清楚：“故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②不过，学衡派同样也“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由于以组织的方式推行文学运动可以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当时掀起了一阵结社的风气。据统计，1921~1923年，全国出现文学社团40多个，而到1925年，社团突破了100个。鲁迅1930年在回忆新文学批评的发生状况时曾说：“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忠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③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批评家往往是属于某个文学团体的。批评家发言，往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因此，文学批评往往表现出一种与个人话语不同的宏大气势。

1917~1927年间的批评群体，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新文学的促进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文学阵营；另一则是新文学的反对派。从研究史的角度看，无论提倡、拥护新文学，或反对、批判新文学，其具体的内容中都包含着对新文学的见解，即使是反对派的观点，也是新文学研究史的一部分，需要做一番检视。下面就先从新文学的反对派说起。

新文学的反对派，主要有四批人。

一是桐城派。

桐城派以林纾、严复为代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学。一个月后，林纾发表《论古文之

① 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1卷2期，1922年8月。

②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③ 鲁迅：《我们要批评家》，《萌芽月刊》1卷4期，1930年4月。

不当废》，唱起了反调。但林纾讲不出古文之不当废的理由，他底气不足地哀叹：“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刘亦自有其不可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① 不能道其所以然，暴露了林纾理论修养的不足。无奈何，林纾作小说《荆生》《妖梦》，对新文化倡导者进行人身攻击，期待荆生等伟丈夫将新文化倡导者打翻在地。眼看白话文运动飞速发展，林纾知道荆生等伟丈夫难以阻挡，他先把希望寄托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又“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并要求蔡元培制止这两个倾向，但结果只遭到蔡元培不冷不热的回应。林纾只好再次上阵，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坚持维护古文的地位，认为“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但这篇文章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林纾最后哀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②

桐城派的另一大将严复曾在一封私人信札中对新文化运动提出批评。他认为，文言文较白话文更富文采是毋庸置疑的，白话文终会因其自身的不合理而自然地被淘汰，“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③ 但是，白话文并没有像林纾和严复所期待的那样“自败”。“天演”的结果，是白话文取得了胜利。白话文得到了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承认，很快推广开来。由于鄙视白话文，桐城派对新文学持整体否定态度，他们对新文学的批评没有多少学理价值。

二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并不反对白话文学，反而主张白话文学，他们创作白话小说的时间比新文学更早。包天笑在其主编的《小说画报》上，就力主“小说以白话为正宗”，认为“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而变为俗语之文学”。^④ 但是鸳鸯蝴蝶派创作的白话小说又不是新文学倡导者所期待的

① 《民国日报》1917年2月8日。

② 《文艺丛报》1919年4月第1期。

③ 严复：《与熊纯如书》，收入《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第699页。

④ 包天笑：《小说画报·例言》，《小说画报》第1期，1917年1月。

那种新文学。因为鸳鸯蝴蝶派注重文学的娱乐性、商业性和世俗性，不像新文学那样注重文学的启蒙性。鸳鸯蝴蝶派向来与新文学“井水不犯河水”，在受到《新青年》杂志的攻击时也无动于衷。但茅盾于1921年1月接任《小说月报》主编，把原属鸳鸯蝴蝶派大本营的《小说月报》变成了新文学的一个阵地，并拒发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由此鸳鸯蝴蝶派对新文学阵营产生了怨恨，开始攻击新文学。鸳鸯蝴蝶派讥嘲新文学内容高深，讽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只见装样，的确有革新气象。接着就看小说，谁知越看就越不明白”^①。郑振铎曾指出：“但当《小说月报》初改革的时间，他们却也感到自己的危机的到临。曾夺其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他们势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未已。可惜这一类的文字，现在也搜集不到，不能将他们重刊于此。《文学旬刊》对于他们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了他们而发的，却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流的诬蔑的话。”^②鸳鸯蝴蝶派的批评没有“严正的理论”，只有一些“不大上流”的话，因此他们对新文学的批评没有多大学术价值。

三是学衡派。

学衡派成立于1922年1月，以《学衡》杂志得名。学衡派成员大都曾留学美国。他们并不反对变革中国固有文化，但认为：“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③如果说新文学阵营代表的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那么，学衡派则代表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他们提倡重视传统，重视历史，主张对传统持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反对鄙弃传统、以暴易暴的革命态度。这种态度在今天仍是有价值的。

学衡派批评文学革命论的思想基础——文学进化论，梅光迪认为，“文学进化，至难言者”，“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④胡先骕逐条驳斥了胡适的“八不主义”，尤其反对以白话

① 寒云（袁克文）：《小说迷的一封信》，《晶报》1922年8月12日。

②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14页。

③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④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文取代文言文，认为文学没有新旧之分，无贵族平民之分，主张保存文言。^① 学衡派还批评新文化倡导者的人格，认为他们“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② 学衡派还曾批评新文学作品。胡先骕批评胡适的《尝试集》：“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规。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③ 缪凤林认为，白话新诗是拾美国自由诗的“唾余”，“乃至以散文名诗，直不知诗之所以为诗者何在矣”。^④ 学衡派确实指出了新文学的一些缺点，但他们否定整个新文学的生存权，显得十分偏激，大为减损了自己本来可以有的思想价值。

四是甲寅派。

甲寅派以《甲寅》杂志得名，其核心人物是章士钊。章士钊本是辛亥革命中的新派人物，但1925年担任教育总长后，在《甲寅》周刊1卷9号、14号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赞美文言文，攻击白话文，声称“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⑤ 又说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⑥ 如果说学衡派还有一些可以与新文学论辩的学理，则甲寅派又不及之，不过甲寅派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正如有人所说：“列位，不要把那老虎运动当作一件小事，这实在比‘五四’时的荆生运动更危险可怕。因为那时的清室孝廉林纾并没有实权在手。”^⑦ 章士钊以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身份，利用职权提倡读经，压迫白话文教育，曾给新文学阵营造成一定的压力。

新文学诞生后对新文学的评论，主要是由新文学阵营中人士进行的，是新文学阵营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检讨。

首先是《新青年》批评群体，其中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人。《新青年》批评群体的主要

①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第1、2期连载，1922年1、2月。

②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③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第1、2期连载，1922年1、2月。

④ 缪凤林：《旁观者言》，《文学旬刊》第22号，1921年12月11日。

⑤ 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甲寅》1卷14号，1925年10月。

⑥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1卷9号，1925年9月。

⑦ 辛民：《言论界之分野》，《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

贡献，在于批评旧文学，扫除了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为新文学开辟了生存空间。

《新青年》批评群体的矛头所指，一是以桐城派、选学派和江西派为代表的旧文学。陈独秀痛切地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① 钱玄同激烈地批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② 二是批判传统戏曲。1917年3月，钱玄同在《新青年》3卷1号上发表致陈独秀信中，激烈抨击传统戏曲。1918年10月《新青年》5卷4号又编发“戏剧改良号”，刊有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这些文章都批判中国传统戏曲，而提倡新的剧种——话剧。《新青年》5卷5号又发表周作人致钱玄同的《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通信，周作人认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国戏是野蛮”“有害于世道人心”，中国新剧的建设“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

在为新文学开辟道路时，《新青年》批评群体还把南社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也当作了旧文学。胡适与钱玄同通信时批判了南社成员苏曼殊的小说：“《绛纱记》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入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今日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者也。《焚剑记》直是一篇胡说。其书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有何价值可言耶？”^③ 周作人激烈批判鸳鸯蝴蝶派的黑幕小说，认为黑幕小说传播的是“最毒妇人心”“恋爱自由之无耻”等毫无人气的古训，断定黑幕小说“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④ 钱玄同批评黑幕小说“内容腐败荒谬”“简直可称做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⑤ 李大钊也指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② 钱玄同：《致胡适》，《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

③ 胡适：《致钱玄同》，《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

④ 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

⑤ 钱玄同：《复宋云彬》，《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

人醇酒之中”。^①

南社的诗文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都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旧文学。但是，《新青年》批评群体只看重文学的启蒙作用，忽视甚至否定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把它们笼统地当作旧文学予以批判。从此，通俗文学一直遭到新文学的排挤。

对于刚刚开创的新文学，《新青年》批评群体则给予了细心呵护。他们坚决维护新文学的合法性，大力肯定新文学的成绩。其中，胡适在新诗批评、小说批评和戏剧批评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胡适提倡“白话新诗”“短篇小说”和“话剧”，制定了新文学在“形式”上的批评标准。胡适还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梳理了新文学的发生史。周作人在小说批评和散文批评中也有突出贡献，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制定了新文学的“思想”和“道德”的标准，并著文反驳一些封建卫道者攻击新文学作品“不道德”的言辞。由于上述贡献，《新青年》批评家很快在新文学批评中奠定了权威地位。

“五四”高潮过后，《新青年》批评群体发生了分化，一些成员淡出文学界，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些成员继续留在文学界，开宗立派。如周作人列名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后来又和鲁迅等人共同创建了语丝社，胡适创办新月社，他们在新文学研究中仍有自己的贡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崛起了新潮社，其主要成员有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北京大学学生。在批评鸳鸯蝴蝶派和传统戏曲中，新潮社批评家表现勇猛。对于新文学作品，新潮社批评家也有零星的批评，其中，傅斯年最早对鲁迅的小说发表评论，罗家伦考察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变迁。但《新潮》杂志很快停刊，新潮社也随之解散。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最初提议建立文学研究会的，是郑振铎、耿济之、耿式之等文学青年，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把当时北大教授周作人、朱希祖、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处参谋蒋百里都列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壮大了文学研究会的声势。他们还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社取得联系，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争取到了《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两块阵地。文学研究会还在各地成立分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的

^①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